



【庄周梦蝶】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大约是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底层人民。”

贫困的中产阶级

周凯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是中国的鸡汤作家还是企业精英,都忙着给芸芸众生灌输一个名词——财务自由。而从真正意义上讲,有资格且有欲望追求并实现“财务自由”境界的社会群体,是中产阶级。

尽管更多的人习惯将“中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但由于阶级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理论逐渐被淡化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界更愿意用阶层来代替阶级这一术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中产阶级开始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一批收入不菲的人群喜欢喝星巴克、买LV,追逐奔驰和宝马。

继而,中产阶级从面目模糊的消费群体,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新兴的希

望阶层。权威官媒《求是》杂志曾在十年前将中产阶级视为和体制内人员、传统的工人、农民相区分的新社会阶层,“从骨骼到肉体,从物质到精神”。而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其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生活里的前进风向标。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发展、壮大,是向着西方“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前进的良性指标。

不过,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却在近年来陷入了举步维艰的状态,不少经济学家将此带来的部分焦虑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他们被困于吃穿住行等刚性需求,例如飙升的房价,即便具备资格也需要参加摇号或者竞拍的车牌,以及子女的上学问题等。

我有一个朋友,算是小有成就的学者,我们经常热烈地讨论关于中产阶级的这一个话题。他对于中产阶级

的定义是,在一线城市至少拥有一至两套房产,月供在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拥有车牌的情况下,能负担得起一部中档小汽车,每年出国旅游两次以上,不时能给妻子买一到两个Coach包。我直率地纠正了他的品味,建议Prada的手袋才应该是中产阶级的标配,除此之外,并无异议。

令人尴尬的是,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朋友很快沦为了“负面”案例。有一回,我一边吃薯片,一边顺手按电视遥控器,赫然看到他正在电视上慷慨陈词,针对其中某一学术问题,我决定与其探讨。电话通了之后,朋友恼怒地告诉我,他正在如家的QQ大床房中为某杂志撰写一篇稿件,“以弥补家用”!原来,自从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后,朋友的中产生活开始“沦陷”了。由于请了月嫂,加上老家来了亲戚照顾婴儿,他的床位已被“霸占”,房贷、车贷加上奶粉钱、大孩子的择校

费、日常生活费,简直让他不堪重负,于是“开源节流”,以往讲究体面的他,毅然选择入住快捷酒店里的特价房!我一边盯着电视里那光鲜的形象,一边想象他在与其气质不相符的特价大床房中蓬头垢面敲击键盘的情景,忍不住又好笑又无奈。末了,朋友兴奋地告诉我:“我的钱包里只剩47元5角了!”看,这一位折翼的中产阶级,仍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好心态。

社会学家们常常将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常常游离于既得利益者和下层人民之间的角力,也因此显得更为平和与屈从游戏规则。不过,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亦无法幸免于社会角力中滚滚而过的车轮碾压。在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事故中,作为一线记者,我曾真正体会到中产阶级无法与现实相切割的困境。在这一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几乎所有的经历者可以归入浙江小城市里的中产

阶层,闲下来,他们会带着儿女出游,会开车去度假山庄钓鱼,会去杭州的银泰百货购入中规中矩的时装,或者在小城特有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或者啄上一盘螺蛳。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遇难者遗体上的卡地亚戒指、AP手表,悲哀地证明了这一点。原本,这些人生,就像按着节奏开动的列车,从整洁的车站出发,开往明媚的未来,却在不可知的天灾人难中,踏上了永无归途的旅程。

前些天,乱翻书看到一个比喻,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开在沙土上的花朵”,大约是“外表光鲜、捏食艰难”的意思。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道理,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和当代畸形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牢牢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说起来,作为一个码字工人,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大约是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底层人民。”

(作者为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庙堂江湖】

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存在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它试图让政府对我们的养老大包干!

问题来了:养老保险哪家强

沈凌

最近社会上对养老金制度改革议论比较热烈。这个情有可原,谁不会老呢?一方面,我们担心现在的养老金基金有缺口,没有足够的钱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养老金缴费比例太高,已经阻碍了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我们的未来也无从保障。我们的制度设计似乎进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从世界范围看,养老金制度无非是两种:一种叫自收自支,另外一种叫现收现支。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两个原则的混合。我们个人养老账户遵循自收自支的原则,我们的社会统筹账户则是现收现支。

自收自支的意思就是政府强迫我们个人把收入的一部分(现在是个

人)都能做,何需假借政府之手?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担心我朝生暮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根本不关心自己的未来,等到了往政府大门口一躺,政府还得替我操心。但是,政府不能假设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吧?如果只有少数人是不顾自己的生死,我们又何必让一个制度来制约全体群众呢?退一步讲,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存钱养老,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少做从多数,让我们选择大多数人最愿意的选项呢?

因为这两个原因都不那么靠谱,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政府,都不那么按照自收自支的原则办社会养老。

第二种方案是现收现支,它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缴费,这个钱拿来养现在的老人;等到我们变老了之后,我们的退休金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缴

交8%,单位交20%,合计接近于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存起来,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完全可以自己完成,并非一定要假借政府之手。现在政府强迫你每年交一定比例的收入存入养老金账户,然后等你老了,再拿出这个钱来给你发放养老金,那么就是一个变相的“强迫储蓄”而已。

那么问题就来了,存钱养老哪家强?政府还是我自己?我明明自己会存钱养老,为啥需要你这个政府来替我做主呢?可能的原因之一:政府比你聪明,能够获得你获得不了的理财高收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至少目前的中国政府并不能得到什么超额的高收益,因为我们的养老金根据规定是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收益率还跑不过通货膨胀。这么安全的保守投资,任何

人都是一个社会救助计划,保证一个养老的最低标准,而我们的老年生活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所提高,有所改善,应该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的。

所以,我觉得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存在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它试图让政府对我们的养老大包干!如果我们能够让政府仅仅专注于统筹账户的现收现支,为低于一定收入标准的穷老人提供一个社会化的养老金,那么我们的政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而我们现阶段的年轻人也不必缴纳这么多的养老金。其次,政府和市场都可以提供的一些养老基金供我们自由选择,作为我们自己存钱养老的投资渠道之一。这样,我们同样可以有养老的保障。说到底,我们现在缺的不是钱,而是钱生钱的办法。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是一个社会救助计划,保证一个养老的最低标准,而我们的老年生活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所提高,有所改善,应该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的。

所以,我觉得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存在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它试图让政府对我们的养老大包干!如果我们能够让政府仅仅专注于统筹账户的现收现支,为低于一定收入标准的穷老人提供一个社会化的养老金,那么我们的政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而我们现阶段的年轻人也不必缴纳这么多的养老金。其次,政府和市场都可以提供的一些养老基金供我们自由选择,作为我们自己存钱养老的投资渠道之一。这样,我们同样可以有养老的保障。说到底,我们现在缺的不是钱,而是钱生钱的办法。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商兵布阵】

欠账还钱是天经地义,可是欠薪的不仅仅是企业主,也有政府机构。

求求你别发年终奖

周家兵

年底了,过春节成为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回家的车票,老人、老婆孩子们的礼物,置办年货,人情往来等,都得花钱。说不定还欠着亲朋好友的钱等着去偿还。于是乎,岁末年初讨论最多的就是年终奖有多少,怎么发。

先说说关于年终奖的高兴事儿。每年这个时候,和家人通电话,总会被问起:今年的年终奖会不少吧?嘴上打着马虎眼,呵呵笑,心里其实怒放成甜蜜的花。同事之间私下里也会就这个话题,閃閃烁烁地聊几句。虽然有些隐忧,但更多的是充满憧憬和期待。效

益好的单位或企业,年终奖是个超级大红包,可以换辆家用小车,也可以大大充实一下理财资金的仓位。有些同事,年终奖还没到手,如何花销早已心中有数,甚至列出了花年终奖的清单明细,认真得让你心疼,又觉得好可爱。一同事去年才大学毕业,他工作后第一年的年终奖,就是要让从没坐过飞机的父母,从老家的大城市坐飞机来深圳过春节。还计划带他们去临近深圳的香港兜兜转转,看看国际大都市的花花世界。父母在电话里说,刚毕业没多少积蓄,别乱花钱,但还是很高兴地去公安局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关于年终奖的这些故事,简单、朴实、温

暖,让人感动。

再说说欠薪的事情。每年这个时候,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讨薪新闻。最近就有几起因为讨薪而导致人命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让人揪心。为了解决欠薪这类问题,官方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限制老赖的一些奢侈消费,甚至将欠薪入刑等,实际上老赖也抓了不少。可类似的事件却一直存在,一直在困扰着打工者,特别是农民工朋友们。年底是欠薪的高发时间段,激烈的讨薪行为总和血腥、生命紧紧相连,甚至有农民工未成年的子女都参与到讨薪的行列中,最终从高楼上跳下,美丽的生命

花朵还未充分绽放就凋谢在欠薪与讨薪博弈的狂风暴雨中。那些极端的讨薪行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似乎想增加那么一点力量,但实际效果有限。欠账还钱是天经地义,可是欠薪的不仅仅是企业主,也有政府机构。经常爆出这样的案例:建筑施工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源头却在地方政府拖欠该企业的工程款。而实际上,民工往往把政府作为讨薪的最后靠山。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我的一位老乡是建筑师傅(泥瓦匠),在全国很多一二线城市建设过高楼大厦。他说,每到年底,我最大的愿望不是想拿多少年终奖。在他的心里、

思维模式里面,压根就没有年终奖这一说。他说,我们这些泥瓦匠最大的愿望是,不要拖欠我们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工资钱,零头去掉都可以,把大头工资结算完给我们,开开心心地回家和家人团聚。他们一年到头都盼着我们带钱回家好好过个年。我调侃他说,要是老板真要给你们发年终奖呢?他脸上开始有笑,慢慢笑容僵化,变得严肃而认真地说,别!求求你别发年终奖,爽爽快快地把工资全部结算给我们就好了。说完,他的眼里饱含泪花。

唉,一言难尽的年终奖!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缘木求鱼】

既然成年人都空前地复杂、细腻起来,并沉溺其中快乐着难以自拔,那当然也就不能埋怨孩子们想得太多。

宝贵的二胎

木木

本人是“60后”,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似乎极少有脑袋上戴了“独生子女”桂冠的,每日紧站在身边“共进退”的,似乎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是别人的兄弟姐妹。那个时候,在城市里的家庭,生养两个小孩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里养三个、五个孩子的也很常见,倒是独生子女极为珍稀,小孩子们游戏的时候,“独苗苗”难免就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那个时候的人,似乎神经都“大条”得很,生孩子,说生也就生了,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有哪家夫妻细腻到想生老二了还要征求老大的意见,反正本人当年是绝没有享受过那样的“优待”的。或许,是由于当时年龄大小,还

难堪此大任?应该也不是,因为从小到大,印象里,似乎就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老大获得过如此的遭遇。

按照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推断,父母的神经如果“大条”了,似乎孩子们的神经就不会小到哪里去。在当代人眼里都宝贝得不得了的老二,在那个年代,于老大而言,好像就从来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这么说,也绝没有彻底否定老二们的存在感的意思,想当年,老大们满院子疯跑,玩打仗抓特务,跳墙头儿捉迷藏的时候,屁股后面总跟着一个似乎怎么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儿”,绝对是一件相当令人抓狂的事情。不过,抓狂也就抓那么一阵儿,是绝影响不了吃晚饭时的大好心情的。

虽然中国人在哲学、美学研究方

面,把“至简”推升到了境界,给予其极高的推崇,比如什么“大道至简”、“大美至简”之类的说法,显得颇为阳春白雪,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似乎神经比较“大条”,也应该不失为一种简约之美。不过,过去中国人的生活大多比较简单,而简单之于复杂才有意义,于简单之中,似乎就很难感悟美的简单;而那一小部分原本就不那么简单的人,大约也没什么心情欣赏这样的所谓简约之美。

因为不简单的人,许多时候,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为了显示聪明,往往忍不住本能地就把原本很简单的事情你来我往、三下两下地就搞得出奇地复杂。“大道至简”、“大美至简”的赞誉,只有面对古董的时候似乎才有意义,在生活中,如果真有大脑缺营养者

一根筋儿地把持着“至简”的路数,估计就顶着白眼儿寸步难行,那场面想必也绝不会美到哪儿去。芸芸众生经年累月地遭到教训,就难免动了见贤思齐的心思,加之物质的日子日益过得乐不思蜀起来,吃饱了没事干的时候,也有样学样地试探着复杂一把,真是情有可原。时间一长,大家都复杂起来,倒越发衬出非常之人的英雄本色来。

既然成年人都空前地复杂、细腻起来,并沉溺其中快乐着难以自拔,那当然也就不能埋怨孩子们想得太多。就此而言,那个十三岁的老大,逼着怀了老二的妈妈做出“有我没他,有我没他”的选择,倒真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而那个只要爹妈签下“永远第一喜欢你”的一纸保证就允

许二胎降生的“大宝儿”,就绝对算得上宅心仁厚、阿弥陀佛了。又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呢?

孩子们的言行,是成年人世界的映射。成年人们整日婆婆妈妈、斤斤计较地在孩子们耳边唠唠叨叨着“在外面可千万不能吃亏、让人欺负啊”,时间长了,小孩子们在家里面吃点儿亏,就都可能是要了命的。这实在在怨不得小孩子。如果这样的场景及未来实在有些可怕,进而难以忍受了,估计还是要从成年人的世界想办法入手改变。如此说来,我们似乎就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宝贵的二胎”了,或许,那些谢了老大的反对而半路夭折的二胎们,让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又清晰了一些。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